

当代 文学杂志研究

D A N G D A I

WENXUEZAZHIYANJIU

韩敏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韩敏著

当代文学杂志研究

D A N G D A I

WENXUEZAZHIYANJIU

——以《收获》为例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文学杂志研究/韩敏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73-2335-1

I. 当… II. 韩… III. 文学杂志-研究-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831 号

当代文学杂志研究

著 者/韩 敏

责任编辑/于俊道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880×1230mm 32 开 8 印张 20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335-1

定价: 21.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绪论：一份杂志与文学精神·····	1
第一章 上海的文化资本与文学杂志·····	6
第一节 上海的文化资本·····	6
第二节 上海的文学杂志之一——《小说月报》·····	19
第三节 上海的文学杂志之二——中国作协的 《收获》与“小《收获》”·····	33
第二章 转型时期《收获》的文学策略·····	46
第一节 纯文学：知识分子漂移的家园·····	46
第二节 文学杂志的市场重组·····	56
第三节 转型初期的文学策略：纯文学家园的守望者 ·····	70
第四节 转型的惶惑：1992年文学生产·····	83

第三章 市场经济时代的《收获》	96
第一节 《收获》的市场策略	96
第二节 《收获》自我身份的确认	113
第三节 《收获》的作家研究	123
第四节 《收获》的散文专栏	136
第四章 巴金与《收获》	155
第一节 编辑家巴金	155
第二节 《收获》的主编：巴金	163
第五章 《收获》与当代上海城市文化形象	172
第一节 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纪实文本：“百年上海” 专栏	172
第二节 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虚构文本：以王安忆的 小说为例	182
第六章 《收获》的新世纪	197
第一节 文化品味的制造者：“先锋”的《收获》	197
第二节 新生代作家的文学身份	208
第三节 新生代作家的家庭课	217
第四节 新世纪的精神地形图	229
主要参考书目	242
后 记	247

绪论：一份杂志与文学精神

2005年10月17日，在华东医院躺了六年的巴金去世了。离世之前的巴金失语多年，但围绕巴金引发的争论却是此起彼伏，在此不愿去评论个中的是是非非。巴金，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中的最后一位，随着他的离世，文学大师的时代也就合上了最后一页。在巴金渐行渐远的背影中，他那种“为别人而活着”的存在的勇气；年近1990依然坚持修订《巴金译文全集》的顽强生命力；以及勇于剖析的自我反省精神；……随着巴金的离去，这些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象征。

尽管有无数的声音表达了对巴金的敬意，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对现代文学经典秩序——“鲁郭茅巴老曹”的质疑，巴金开始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话题。评论界对巴金的质疑与敬意都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是无论是表达敬意的，抑或充满质疑的，对巴金的研究都忽视了巴金在当代文学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学活动，即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者”《收获》杂志主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缺乏对巴金与《收获》的关系研究，作为对文学家的巴金研究，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残缺，因此也不是完整的巴金研究，因此巴金与《收获》的关系研究将是本书论述的一个重点，以此全面勾画作为完整的文学家巴金的形象。

巴金的文学生涯贯穿了中国 20 世纪文学，他与靳以共同缔造的《收获》杂志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一面镜子。经历了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的《收获》既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忠实书写者。如今进入文学史的许多作品都是来自于《收获》：从“十七年”时期的老舍的《茶馆》（1957 年创刊号）、周立波的《上海的早晨》（1958 年第 2 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 年第 6 期）、郭沫若的《蔡文姬》（1959 年第 3 期）、柳青的《创业史》（1959 年第 6 期）、李劫人的《大波》（1960 年第 2 期）、浩然的《艳阳天》（1964 年第 1、2 期）；“新时期”谌容的《人到中年》（1980 年第 1 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0 年第 1 期）陆文夫的《美食家》（1983 年第 1 期）；先锋经典文本马原的《虚构》（1986 年第 5 期）、王朔的《顽主》（1987 年第 6 期）、格非的《迷舟》（1987 年第 6 期）、余华的《世事如烟》（1988 年第 5 期）；新世纪刘志钊的《物质生活》、潘婧的《抒情年代》等等，《收获》几乎是挺立于每个时代的浪尖。没有《收获》的当代文学将是残缺的，它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活动场域，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发现作家方面，显示了作为一份权威文学杂志应该具备的文学判断力。本书以《收获》作为一个细小的关照视角，以此进入对当代文学，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谈及到艺术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以及艺术对共同生活重要性；第二个阶段则是艺术自身的价值以及试图从共同生活中剥离出来；第三个阶段则是艺术与共同生活的重新结合起来，在这个阶段是以“传播”为中心。假如说第一个阶段是前现代艺术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现代艺术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以多元化的媒介传播技术为中心的文化工业的阶段。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则经历了威廉斯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艺术的过渡与转型。本书着重研究1990年代以来的《收获》，以此勾画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则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视野，以此探究两个时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内在的承接性。

1980年代，人们需要文学，需要文学来释放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的心理创伤，在大众媒介不发达的1980年代，文学杂志实际上承担了超越文学本身的社会责任，正是这种超越界限的责任造就了1980年代文学杂志的辉煌，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到路遥的《人生》，作家制造了新时期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话题，于是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习惯了聚光灯下的生活，当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系打碎了这个黄粱美梦之后，他们发出了重建“人文精神”的呐喊，但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重组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在这种重组过程中，文学杂志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定位的市场化转化。如果1980年代的文学生产是以作家为中心，1990年代的文学生产则以读者，或者准确的称谓应该是文学消费者为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1990年代的文学界定为编辑的文学，

此起彼伏的文学旗号既是文学杂志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形象的定位，同时也是招徕消费者的文学“叫卖声”。1990年代的文学开始从1980年代读者走向作家转变为作家主动向读者示好。本书以1990年代《收获》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市场策略为主要研究方向，实则想要透析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方式变化的本质。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政治的力量曾经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那么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文学生产的转化，则是经济的力量在改变中国文学的生产，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深入研究1980年代与1990年代文学生产方式的差异将是整合20世纪文学的非常重要的关节点。

面对从各种途径收集了从创刊以来的《收获》，这里有多少作家曾经满怀对文学的近乎殉道的崇高理想，就像承载他们的理想的《收获》杂志本身一样，其中一些早被岁月的尘埃遮蔽了，有的被虫蛀了，还有多少作家和作品留存在当前读者的视野中？还有多少进入到文学研究者的搜索范围内？许多作家在踏入文学圣殿的时候，都心怀书写经典的理想，在历史的尘埃与时间的虫蛀下，这些理想显得如此的脆弱。经典总是少数，更多的作家和作品就在经典形成的历史道路上消失了。文学杂志，就是提供了一份记录消失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家的群体形象。对文学杂志的研究，或许就是对这群消失在经典形成历史的消失者的一次历史还原。

因为研究的需要，2004年3月我去了上海，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习惯了重庆生活的我，感觉到那一年上海的春

天比重庆的冬日还要寒冷。作为一名1980年代末期进入大学，曾经深受19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精神浸染的文学青年，大学时代就对《收获》充满了崇拜，那时《收获》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是必读，因为那时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文学思想，以为《收获》就是文学。在当代文学老师大谈《艳阳天》、《人到中年》的时候，我成天看的则是余华、苏童、格非、洪峰等人的小说。10多年后，当我走进了大学时代心仪的《收获》杂志社，当我表明了来意，主编李小林和肖元敏女士开始的热情介绍，编辑部主任钟红明为提供文章所需要的资料，旁边的编辑在认真地看着稿件，我突然感觉到10多年前阅读《收获》时的欣喜又敲响了早已难以动心的心扉，1980年代那种为文学而激情飞扬的青春并没有因为衡山路上迷离的灯光而模糊。虽然都在一个城市，巨鹿路和衡山路其实是两条路。对于大多数的文学爱好者，上海不仅有醉眼迷离的衡山路，还有巨鹿路，还有巨鹿路上的《收获》，上海因为《收获》而丰富，一座城市与一份期刊就有了血脉相连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喧嚣，因为生活的浮躁，我们或许依然需要文学给予我们的宁静，为此，《收获》将依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章 上海的文化资本 与文学杂志

第一节 上海的文化资本

这个世界就如崔健十多年前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我们每天醒来，拎着手包，挤进车流如织的塞车大道，车厢内此起彼伏的手机的铃声令你迟到的恐惧更甚，然后是成天电脑里了无生趣的数据和文档。当然空隙期间，还可以打开 QQ，扮演一下爱情的圣徒，或者十足的小资，或者是文雅的波波族，在这样虚拟的空间中，那些久违的感觉不时还可以浮现。虽然每天有各种媒介在倡导各种生活方式，为我们在谋划各种角色，但是偶然的闲暇也会令我们感到，在五光十色的都市中“我”不知何去何从，我们找不到自己，我们是谁，我们无法回答。于是，我们在历史中寻找，我们开始怀旧，在过去的碎片中映照着自己的，还是那些破碎

的身影；在都市中寻找，在那些还依然残存的旧城中的街巷里弄中寻找，在水泥森林中，在摇曳的街灯中，在酒吧暧昧的音乐中，都市人在寻找着自己。我们需要某种确定的物件来标示自我，表白自己，于是思想家就我们提供了城市文化地标。上世纪末的各种老照片，还有近期由湖南卫视掀起的“象形城市”的勾画，很多学者也卷入到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的定位的讨论之中，他们试图通过城市的某一个建筑，作为城市灵魂的象征。或许，在这些象征符号中，我们依稀能够找到自我的身影。

上海的“石库”、“工人新村”、“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广州的“骑楼”；北京的“环线人”形象；杭州的“孤山”等等，在学人为自己的城市的寻找灵魂地标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学术寻找文化身份。因此，才有上海学者张闳和朱大可关于“工人新村”和“石库”之争。“工人新村”代表了上海1950到1970年代的时代主角，居住在这样的“工人新村”的工人阶层占据了上海人口很大比例，他们曾经是中国GDP60%的贡献者，同时他们也是当前失业大军中的主要构成者。“石库”是代表了中西文化合璧的民居，这种视野显然是沉浸在衡山路上的酒吧和咖啡馆的情调之中。试图以某一处建筑来凝聚城市的精神，这种符号化的阐释行为本身就是极其冒险的行为，当我们想要对自己的所在城市进行表述的时候，符号的有限性就显现出来了。

新浪和湖南卫视联合在网上举行了“哪部电影最能表现上海的精神？”的调查活动，有6个备选答案，分别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阮玲玉》、《花样年华》、《苏州河》以及“其它”，总共有6545人参加（截止2003年10月20日），

排在第一位的是《花样年华》(3051, 46.62%)。由此看来在普通人的视野中,上海还是风花雪月的上海,还是那些穿着旗袍,唱“夜来香”的时髦女郎的上海,这是一般人对上海城市的想像。同时新浪网还对上海的代表性建筑区域进行了调查,“外滩”以绝对的优势占据第一位。联结内河和大海的外滩,确实能够阐述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文化内涵,它巨大的包容性是其发展的关键性格。这也是普通人对上海城市想像。

不管是思想家还是普通人在勾画城市的文化形象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审美的方式来把握日常生活。不管是以“工人新村”还是“石库”或者是“外滩”和“东方明珠电视塔”来表述上海,这都是媒介中的上海,是审美的上海。其实这些形象与大多数的上海市民的生活无关,他们每天依然是按时挤公交车,准时上下班,到菜市场买菜做饭,晚上守着电视机,那些形象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是,在发达的媒介时代,它们却成为了上海人生活的背景。

当我们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时候,在北京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广州的商业文化传统映照下,上海文化显得更加五光十色,因此在对上海的城市文化表述上就更有歧义,因为上海既有丰厚的商业主义传统,也更有醇厚的文化积淀,而这种文化积淀主要就是依赖于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发达的文化传播系统。可以这样说,正是发达的文化传播系统造就了今日我们对上海的文化想象,就像现在一般人想象上海时,就想起《花样年华》一样;而关心下层民众的学者则会想到“工人新村”;像卫慧那样时尚青年则会想到衡山路上酒吧暧昧的灯光……发达的媒介为大众提供了各自的想象空间,今日上海是暧昧的,是多义的,是矛盾的。50多年前的林语堂先生也曾经同样满

怀矛盾的心境书写了上海的“颂歌”：

“上海可怕，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于：她是光怪陆离的东西方下流混合处，她那表面的繁华，掩饰着她的空虚、平庸和低级趣味，她也赤裸裸地表现出拜金的狂热。她的可怕在于：她满城都是矫揉造作的女人，做牛做马的苦力，枯燥乏味的报纸，资本短缺的银行以及民族意识淡薄的人。她的可怕在于她的伟大也在于她的虚弱，可怕在于她的畸形、邪恶与愚妄，可怕在于她的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可怕在于她巍然耸立于黄浦江岸的石砌的大厦和靠从垃圾桶里拾破烂为生的贫民。我们实在可以为这座可怕的大都市高唱一首这样的颂歌：啊！伟大而神秘莫测的都市，为你的伟大、为你的神秘莫测而三呼！”^①

今日的上海与 1930 年代的上海是同样的矛盾与多维。1990 年代初期以浦东建设为契机，上海新一轮发展恢复了上海 1930 年代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在当前对上海文化的想像中，1930 年代的上海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是研究上海现代文化的代表，张旭东的《上海怀旧：王安忆与现代性的寓言》以及《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非主流写作与现代神话的消解》，还有王德威的《半生缘，一世情：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是

.....

^① 林语堂《林语堂散文》，李晓明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38 页

上海现代性研究的代表论文。

当前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中，文化研究非常注重城市文化的物化形式，“由于把一些建筑、物质产品与商品认定为‘艺术瑰宝’而加以典范性的保留，一些特殊的城市就因此积累了自己的文化资本。”^① 比如像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罗马的米开朗基罗、埃及的金字塔，以及雅典的荷马等等。对于这些城市来说，这些建筑或者诗人无疑已经是成为文化资本了，它们无疑是城市文化形象的主要资源。不管是“工人新村”或者“石库”也好，还是“外滩”或者“东方明珠电视塔”也好，对上海来说也是一种文化资本，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阮玲玉》或者《花样年华》等等，这些是在媒体中客观化了的上海的文化资本。正如上世纪初一位在政界任职多年的姚云鹤先生分析上海与北京的差异时指出的：“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② 所谓的“社会中心点”，按照现代化的观念来看，上海一直以来就是中国人 100 多年来追求的现代化的理想范本：它既有现代精神文化，也有现代的物质文化。现代精神文化即以 1930 年代的上海文化为代表，现代物质文化以 1950 年代的相对先进的工业化生产为代表，再次即是 1990 年代后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崛起。正是上海城市文化中包含了现代性的物质与精神的两个维度，因此在 20 世纪末期成为学术

①（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② 参见施宣圆主编，《上海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0页

界关注的中心。

1930年代的上海不仅在经济，而且在艺术文化等领域都远远地走在亚洲其他大城市的前面。从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迎来了她第一批来自福建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开始，一批批有一技之长的移民湧入上海，1930年代孤岛经济的畸形发展使上海的大众规模不断扩大。在1910年上海的人口只有128.9万，到1949年就已经达到506.3万。^①与这个庞大的大众群体相应的大众文化品味的都市文学首先在上海发展起来了。

虽然广州与上海同时在《南京条约》中“沦落”为通商口岸，但是广州却没有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多重性。1930年代上海《良友画报》的记者从广州采访归来，总结了广州的三个特点：一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二是本土的而非异族的；三是变化的。今日的广州的文化形象几乎还是如此。上海作为独具一格的大都市，“从它们作为文化生产中心来看，也许拥有很强大的文化资本，它们不仅拥有一直在不断扩大的艺术部分，而且还拥有时尚、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旅游与闲暇等大众文化产业。”^②而这种文化资本，广州显然是不具备的。上海的这种文化资本有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尤其是1930年代的上海，是这种文化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1930年代的上海作为亚洲的中心城市，其发达的报纸、杂志、出版以

①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英)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及电影等各种发达的传媒业，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的主要内容，这也成为怀旧视野中的上海城市形象的主要想像资源。

上海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就是文化市场的形成。因为只有文化市场形成后，大量的知识分子或者文人才有在此长期生活的可能性。当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生活方式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结束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对国家体制依附转向在市场中生存。由此，文化市场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生活场域。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而形成市场经济，剧增的城市人口为文化市场提供了消费群体。在这个方面，上海一直是走在中国的前列。与上海相比，重庆和昆明因为战争的原因都曾经聚集了数目庞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两个城市都没有拥有像上海一样的文化资本。老舍在重庆北碚写了《四世同堂》，可惜京韵大鼓的韵味与重庆的麻辣烫无关；梁实秋在“雅舍”的写作也与重庆无牵挂；还有在国泰电影院流连的影星们，重庆不过是他们银幕生活中的一瞥而已……重庆依然是没有根基的码头文化，还有每天爬坡上坎的石梯文化。还有像昆明，如今也只留下像汪曾祺先生笔下那种“跑警报”的语境，今日的昆明依然是那种没有积淀的花草世界。大量的知识分子群聚重庆和昆明，却没有为它们带来文化想象的资源，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上海的文化市场，这是知识分子在游离了国家体制之后的主要生存语境。因此，在抗战结束不久，这些游居于重庆、昆明的文人雅士很快就又回到了北京、上海。

在上海的文化生产历史，第一批主动契合文学消费者品味的，则是向来被近现代文学研究家所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以前的对这个文学派别的研究中，意识形态的视野遮蔽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开创性作用。在这些意识形态的研究视野中，